

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收入份额

冯典状 张卫国*

内容提要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广大劳动者跻身中等收入行列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基于 2014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本文手动搜集整理了城市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信息，并与沪深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匹配。以城市人口规模为断点，本文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收紧户籍制度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显示，收紧户籍制度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抑制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以及改变劳动力市场规模三个渠道影响劳动者的就业环境。

关键词 户籍制度 模糊断点回归 劳动收入份额

一 引言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近年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和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实践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贯彻落实以上重大部署、实现预期目标，要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条件（蔡昉，2023）。然而，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知仍然不足。作为限制人口流动和资源自由配置的关键因素，户籍制度扭曲了跨区域要素配置，降低了潜在劳动

* 冯典状，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fend-dream@outlook.com；张卫国，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zwg@swu.edu.cn。本研究得到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重点项目（编号：2023-CQ-XZ-06）的支持。

力供给（都阳等，2014）。户籍制度改革还通过减少技能和户籍歧视、降低福利待遇偏差等途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Askenazy, 2005; Kongsamut et al., 2001; Young, 2000）。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从现有改革历程中汲取经验教训。

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决定了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Benjamin et al., 2008）。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还有助于提升经济活力、增强经济稳定性（Daudey & García-Peñalosa, 2007）。自1993年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07年才保持稳定（白重恩、钱震杰，2009；李荣坦，2015；刘亚琳等，2022）。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吕光明，2011；Karabarbounis & Neiman, 2013）。与卡尔多事实相悖，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引发了学界从社会保障（蔡萌、岳希明，2018）、不完全竞争（Brooks et al., 2021）、经济结构（李荣坦，2015；罗长远、张军，2009）、经济全球化（Daudey & García-Peñalosa, 2007；Karabarbounis & Neiman, 2013）、税收（郭庆旺、吕冰洋，2011；汪昊，2023）、劳动力转移（常进雄等，2019）等多个方面的广泛讨论。

自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户口登记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呈现出以户籍制度划分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户籍制度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为农村和城市部门，不同部门之间的跨区域流动障碍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市劳动力短缺并存。这不仅限制了城市生产率的提高，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Brandt et al., 2013；Feng et al., 2024）。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力量作用渐强，二元经济结构的松动促进了城乡间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管制不仅直接改变了企业的雇佣行为（Wang et al., 2021），还通过分割市场、扭曲资源配置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Coşar et al., 2016；Meng, 2012）。综上所述，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消除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从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部分研究认为，劳动力转移对户籍制度变动的弹性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并且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存在阶段性差异。随着劳动力转移进程的推进，放松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由负向变为正向（翁杰、张锐，2017）。也有研究指出，破除户籍制度壁垒能够通过影响企业雇佣行为、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降低资本产出比从而提

升劳动收入份额（都阳等，2014；李连友等，2023）。

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本文借鉴曹晖和罗楚亮（2022）、An et al. (2024) 的研究，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以下简称《意见》）为政策冲击，基于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进行分析。《意见》中提到“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并要求“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即要求在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完善户籍积分制度、规范人口服务和管理，事实上释放出收紧大城市户籍制度的信号。本文利用手动搜集整理的地级市政府政务信息公开文件和年度工作报告、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以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依照城市人口规模区分政策处理组与对照组，评估了收紧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表明，收紧户籍制度通过降低劳动者议价能力、减少企业薪资水平和劳动雇佣、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收入、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入门槛、缩减劳动力市场规模等途径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经过带宽敏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剔除敏感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

从现有研究来看，Wang et al. (2021) 基于2001年以后的城镇化发展数据，结合74个城市在2007年之前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信息，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放松户籍限制对企业雇佣的影响。研究表明，放松户籍限制通过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强企业减税激励的敏感性，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雇佣水平。结果表明，放宽户籍制度在微观企业层面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和经营绩效。翁杰和张锐（2017）采用市级人口总迁移率作为户籍宽松程度的代理变量，基于1997-2012年的中国省面板数据，分析了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推进，放松户籍限制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对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积极作用。李连友等（2023）基于73个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两次渐进式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破除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壁垒，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雇佣规模、人均薪酬和绩效，从而提高了劳动收入的比例，凸显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在改善企业人力资源配置和劳动者收入份额方面的积极效应。

与上述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本文利用手动搜集整理的地级市政府政务信息公开文件和年度工作报告提炼户籍制度改革信息，将样本拓展至199个城市。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本文发现2014-2016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显著提高了

落户门槛（张吉鹏、卢冲，2019；Chen et al., 2024）。第二，本文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利用收紧户籍制度的城市人口阈值识别局部处理效应，避免了多时点双重差分可能存在的中期权重偏误、协变量动态变化、末期对照组难以选取等问题。第三，本文拓展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从劳动力市场规模视角解释了城市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增长停滞并存的现象。

本文按以下思路展开：第二部分结合制度背景归纳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第三部分介绍基于城市人口规模的断点回归研究设计及数据处理过程，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机制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制度背景及文献回顾

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调工业化优先。自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实施以来，通过集中国家资源、控制劳动力流动、提高工业发展优先度和控制社会成本等方式，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户籍制度自设立时就存在争议，主要焦点在于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和城乡利益分配不平等。但在工业化初期，户籍制度确实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为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在21世纪初，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流动人口，是中国制造得以凭借低成本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原因，也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之一（彭希哲等，2009）。

2012年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改善速度放慢、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放缓（陆昉、蔡昉，2016）。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求更加迫切。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办发〔2011〕9号）出台，旨在推动城镇化依法健康有序进行，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然而，2014年户籍城镇化率仅比2012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2.2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落户门槛与实际人口分布之间不匹配程度的加深（田明等，2019）。此外，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的城镇化政策与农民工进城意愿之间存在结构性不匹配，即存在“愿落不能落、能落不愿落”的困境（程郁等，2022）。《意见》在中小城市为农民工进城落户和统筹户籍制度进一步扫清了制度障碍。

一般而言，城市能够提供比农村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使得农民工

和农村居民希望迁移到城市。放松户籍制度使农村居民能够合法迁入城市，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从而提高劳动力供给，并释放被户籍制度压抑的消费需求（蔡昉，2023）。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不仅有助于形成积极的经济循环，促进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学界普遍认同放松户籍制度具有诸多好处，例如能够刺激消费（Molnar et al., 2017）、提高资源配置效率（An et al., 2024）、增加劳动力供给（宋扬，2019；Young, 2000）、提高流动人口收入（孙文凯等，2011）、激发经济增长以及改善社会福利等（都阳等，2014）。

然而，出于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成本较高（邵光学，2015；宋扬，2019）、收入分配不均衡以及加重社会保障体系负担（陆益龙，2008；魏万青，2012）等方面的担忧，如何权衡户籍制度改革的收益与支出存在广泛争论。目前，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收益成本的分析主要通过计算和对比户籍改革的直接经济收益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揭示劳动力配置优化的潜在经济效益，鲜有研究系统地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初次分配格局可能带来的影响。从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的视角出发，本文将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更加直接的经验证据。

户籍制度改革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对生产活动和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进而改变劳动收入份额。首先，放松户籍限制能够提高潜在劳动力供给，降低劳动力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倾向于增加劳动力投入而非资本投入（罗长远、张军，2009）。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管制限制了劳动力在部门间、地区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形成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与资本相对价格扭曲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还加剧了城市劳动力不足而乡镇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导致企业技术进步更加偏向资本而非劳动，从而压抑劳动力需求并降低雇佣水平（Zhang, 2019）。因此，放松户籍限制不仅可以通过缓解二元经济格局中要素价格扭曲、提高劳动供给，还可以通过引导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总的来说，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和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均会促使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降低资本密度，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其次，在规模效应方面，放松户籍限制扩张了劳动力市场，提高了职岗匹配度。求职者具备的差异化人力资本也会进一步强化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Moretti & Yi, 2024）。以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保障，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但没有增加就业竞争压力，反而通过包容性就业、技术创新与扩散、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等途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工资水平（陆铭等，2012）。此外，劳动者本身也是消费者。户籍制度改革释放的消费潜力将为内循环增添新助力（蔡昉，2023）。因此，

放松户籍限制不仅能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有助于提振经济内在活力和劳动者收入水平。

最后，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提升也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渠道。放松户籍限制有利于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在落户后将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能够在面临不公平的劳务市场待遇时，利用更多手段和更完备的法律渠道维护自身权益（蔡萌、岳希明，2018）。这能有效改善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争取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积极影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放松户籍限制通过调整劳动力和资本相对价格、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和提升劳动力议价能力三个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说：放松户籍限制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而收紧户籍限制将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介绍

（一）识别户籍制度

《意见》明确指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并要求“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作为一种原则性分类并不构成精确断点。因此，本文需要识别地方政府是否落实了该政策^①。现有户籍制度或落户门槛指数识别策略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解读政策细则或政策文本，二是统计新增落户人口。具体而言，识别不同城市落户门槛可通过统计或整理落户条件细则（吴开亚等，2010；张吉鹏、卢冲，2019）、政策文本分析（Wang et al., 2021）、新增户籍人口占比（蔡昉等，2001）、流动人口获得本地户籍概率（Meng, 2012）等方式实现。解读政策细则的优点在于能够提供较为全面和具备前瞻性的深度分析，缺点是可能存在主观判断。统计新增落户人口的优点在于客观性强、易量化和广泛应用，但缺点是存在滞后性、局限性和数据质量问题。结合这两种方法

^① 上述推断及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依据与合理性在于：第一，中央政府政策逐级下达的过程相较于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数据统计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第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确保稳定的财政收入，更倾向于优先扩大本地经济规模，同时减轻财政负担。因此，不同区域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时存在中央-地方政府间与政府-企业间的激励不相容现象，导致地方政府在具体实施改革时不够积极主动（蔡昉，2023；陆铭等，2012）。

可以更全面和准确地评估各地户籍制度和落户门槛的实际情况。为了精准识别地方政府对《意见》的落实情况，本文采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搜集和分析政府网站公开文件识别出该地是否加强了城区人口规模的控制，共获得 199 个地级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信息^①。此外，本文还通过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落户年份指标，基于统计新增落户人口的思路进一步识别了户籍制度改革。

（二）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由于城市人口规模不构成精确断点，本文借鉴 Lee & Lemieux (2010) 的思路，采用以下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研究收紧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Ref_{it} = \alpha Threshold_{it} + f(Pop_{it} - 500) + C_i + F_j + Z_c + X_{ijt} + \pi_{it} \quad (1)$$

$$LS_{ijt} = \beta Threshold_{it} + f(Pop_{it} - 500) + C_i + F_j + Z_c + X_{ijt} + \mu_{ijt} \quad (2)$$

$$LS_{ijt} = \tau Ref_{it} + f(Pop_{it} - 500) + C_i + F_j + Z_c + X_{ijt} + \varepsilon_{ijt} \quad (3)$$

式 (1) 至式 (3) 分别代表第一阶段回归、简化回归和第二阶段回归方程。式 (1) 和式 (2) 中， Ref_{it} 和 LS_{ijt} 分别表示第 i 个城市在第 t 年收紧户籍制度的概率和第 j 个企业在第 t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份额的定义主要参考了白重恩等 (2008) 的方法，采用支付给职工的现金与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固定资产折旧) 之比衡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Threshold_{it}$ 是一个用于识别城市人口是否超过 500 万人的虚拟变量。 Pop_{it} 是第 i 个城市在第 t 年的人口，也是本设计中的驱动变量。 $f(\cdot)$ 是驱动变量的局部函数。基准回归采用三角核加权局部回归方法，该方法为更接近 500 万人口的观测值提供了更大的权重。城市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被分别控制在 C_i 、 F_j 和 Z_c 中。参考已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研究，本文将税率、地方经济、企业规模和财务状况等因素纳入控制变量 X_{ijt} (李连友等, 2023; Li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1)。本文合并了 2014 - 2019 年的样本，通过 Imbens-Kalyanaraman 法最佳带宽选择规则 $h = \min \{h_{\text{第一阶段}}, h_{\text{简化回归}}\}$ 设定了 174 万人的带宽 (Lee & Lemieux, 2010)。

（三）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宏观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

^① 具体地，通过整理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新闻中心、政府动态、统计公报、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等栏目内容，查找和甄别有关“贯彻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严控人口”“控制人口规模”“加强人口管理”“积分落户”“落实以积分制”“落实居住证制度”的描述，经过反复比对，基本识别出地方政府对《意见》中“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落实情况。

建设统计年鉴》，结合手工整理的户籍制度改革信息，共获得包含 199 个城市和 1169 个样本的城市面板数据。企业数据来自 CSMAR，该数据覆盖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中 16 个门类。其中涉及账面问题 (ST、*ST 或 PT)、金融行业以及存在异常观测值的企业被剔除，所有连续变量均在 1% 水平上缩尾处理。本文最终得到包含 1084 家企业和 5850 个观测值的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年份与企业所在城市这两个关键信息将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相匹配，得到最终数据集。考虑到新冠疫情对经济及就业的冲击较大，且在 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发改规划〔2019〕617 号) 要求“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故本文将样本时间定为 2014-2019 年。图 1 展示了企业在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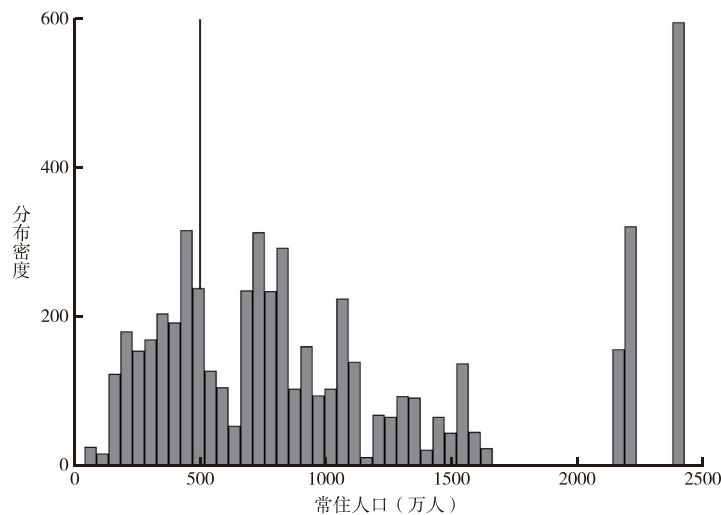


图 1 企业在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和国泰安金融数据库计算得到。

断点回归设计旨在估计局部处理效应。表 1 将 300~700 万人口城市的企业样本分列对比，可见在 300~700 万人口城市的样本范围中，断点左、右两侧收紧户籍制度的概率均值分别为 0.094 和 0.258。这说明城市人口规模高于 500 万人的城市更有可能出台规定限制人口流入。断点左、右两侧劳动收入份额的均值分别为 0.279 和 0.273，表明大型城市中劳动收入份额较低。对比 450~550 万人口规模城市中的样本分布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表 1 核心变量的描述信息

人口范围 (万人)	[300, 500)	[500, 700)	组间差距	[450, 500)	[500, 550)	组间差距
收紧户籍制度概率 (均值)	0.094	0.258	0.165 ***	0.031	0.405	0.374 ***
劳动收入份额 (均值)	0.279	0.273	-0.006 ***	0.274	0.258	-0.016 *
观测值	944	548		310	12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和手工整理的户籍制度改革信息计算得到。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收紧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首先采用图形展示二次型拟合模糊断点回归的结果。图 2 上部分展示了第一阶段驱动变量与收紧户籍制度概率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收紧户籍制度的拟合曲线在断点处向上跳跃，即当城市常住人口超过 500 万人时，收紧户籍制度的概率向上跳跃。这说明城市人口规模更大的地方政府更有可能依据《意见》出台管控城市人口规模的措施。图 2 下部分展示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由图可见，拟合曲线在断点处向下跳跃，即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断点处产生了明显的向下跳跃，说明收紧户籍制度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参考 Calonico et al.(2017) 的方法设定了有效率的最优带宽，并重新估计了式 (1) 和式 (3)。表 2 第 (1) 列的估计结果证实了在图 2 中展示的收紧户籍制度概率断点：随着城市人口超过断点，收紧户籍制度的概率显著上升 4.0%。表 2 第 (2) 列的结果表明，收紧户籍制度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 4.1%。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上述结论可靠，本文开展如下稳健性检验^①。首先是平滑性检验。断点回归设计能够成立的核心前提是协变量在断点处不出现明显跳跃，即协变量不受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从而确保协变量与随机扰动项无关。具体而言，本文将协变量和城市人口规模分别作因变量和驱动变量进行断点回归^②。分析结果发现协变量在断点处基本平滑。

① 鉴于篇幅原因，稳健性检验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② 本文针对以下协变量进行检验：企业资产规模、财务杠杆率、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盈利能力、成长性、产权性质、经济发展和综合税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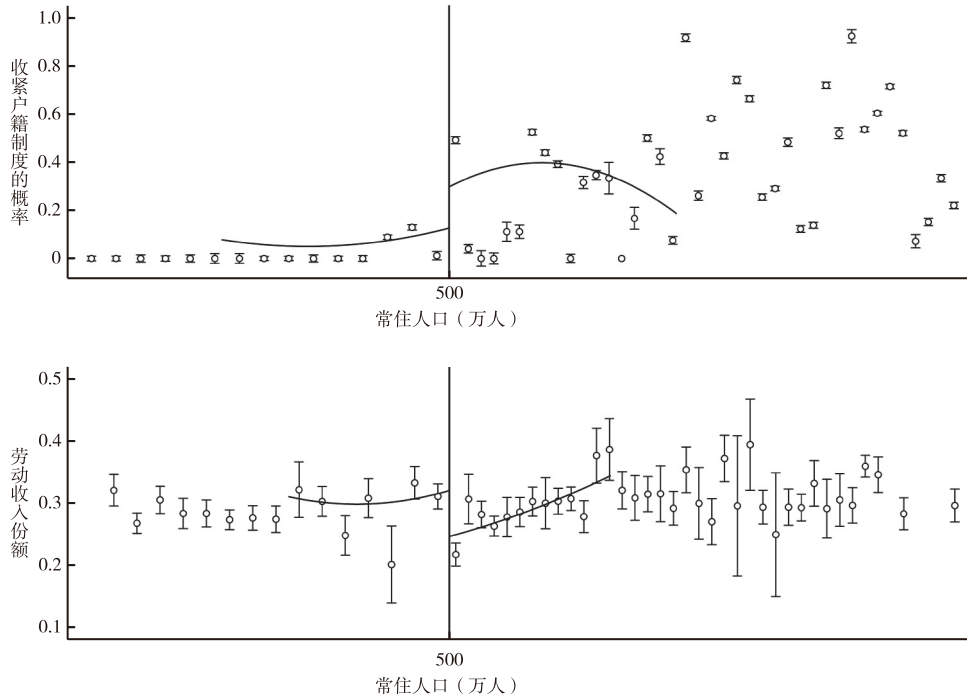


图2 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收入份额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和手工整理的户籍制度改革信息计算得到。

表2 模糊断点回归结果

	收紧户籍制度	劳动收入份额
	(1)	(2)
收紧户籍制度		-0.041 *** (0.007)
人口超过断点	0.040 ** (0.018)	
控制变量	是	是
带宽	286	174
样本量	1339; 509	841; 413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5%、1% 的统计显著性；“样本量”一行分号两侧为估计所采用的带宽。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和手工整理的户籍制度改革信息计算得到。

其次是尝试不同次型拟合。由于不同次型拟合存在无法捕捉实际趋势的欠拟合和捕捉过量噪声的过度拟合两类情况，为了避免估计过程中信息利用效率造成的估计结果失真，本文分别采用线性拟合、三次型拟合和四次型拟合进行分析，所得结论与基准模型结论一致。

再次是带宽敏感性检验。带宽决定了驱动变量局部函数 $f(\cdot)$ 在断点两侧选取多大范围的数据进行局部拟合。过大或过小的带宽选择都会影响估计结果。较小的带宽可能导致样本量不足、估计结果不稳健；较大的带宽引入更多样本，在降低估计局部性的同时又增大了偏差。因此，通过带宽敏感性检验，可以检验带宽选择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从而确保结果的稳健性。具体地，本文分别采用 25%、50%、75%、125%、150%、175% 和 200% 最优带宽对式 (3) 中收紧户籍制度系数 τ 进行估计，结果发现 τ 在不同带宽下均显著为负，表明结果基本稳健。

第四是操纵测试。断点回归设计能够成立的另一重要前提是驱动变量即城市人口无法被企业操纵。如果这种操纵存在，那么断点两侧的企业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破坏断点回归的局部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开展操纵测试以验证断点选择的合理性，确保结果不受操纵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对断点两侧样本开展 McCrary 密度测试 (Lee & Lemieux, 2010)，结果显示断点左右置信区间较为吻合且不存在明显跳跃，操纵测试得以通过。

第五是甜甜圈检验。为了检测结果是否依赖于断点附近的数据，同时进一步避免操纵风险，借鉴 Barreca et al.(2011) 的思路，本文开展甜甜圈检验，分别剔除断点附近 5%、10%、15%、20%、25%、30% 带宽的样本后重新估计 τ ，发现 τ 估计结果均显著为负，结果通过甜甜圈检验。

最后是安慰剂检验。为了验证假设效应的特异性、排除潜在混杂因素的干扰、增强因果推断的可信度，本文分别以 300、350、400、450、550、600、650 和 700 为假想断点重新估计 τ 。对比发现，仅有基准回归处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其余假想断点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安慰剂检验得以通过。

(三) 替代效应与劳动力议价能力

收紧户籍制度降低了潜在劳动力供给，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采用更多的资本而非劳动力 (罗长远、张军, 2009)。具体表现为企业资本密度提高，劳动雇佣规模下降，金融化程度提高。此外，由于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同等水平的社会服务，这可能导致其在面临不公正的职场待遇时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降低其议价能力 (蔡萌、岳希明, 2018)。上述调整均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本文通过 (员工薪资 - 行业

最低薪资) / (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 - 行业最低薪资) 计算雇员议价能力 (Fanfani, 2023), 采用 (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 资产总计和是否持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股份度量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和金融持股 (张成思、张步县, 2015)。表 3 中展示的估计结果显示, 收紧户籍制度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雇佣和员工的议价能力, 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观察表 3 第 (6) 列发现, 收紧户籍制度降低了工资水平。总体来说, 上述检验表明, 收紧户籍制度使企业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 减少了劳动投入, 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表 3 替代效应估计结果

	资本密度	劳动雇佣	金融化	金融持股	议价能力	工资水平
	(1)	(2)	(3)	(4)	(5)	(6)
收紧户籍制度	0.334 (0.363)	-0.753 * (0.453)	0.138 *** (0.036)	0.068 (0.071)	-0.055 *** (0.019)	-0.339 *** (0.0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中心化 R ²	0.520	0.440	0.560	0.188	0.449	0.406

注: 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1% 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和手工整理的户籍制度改革信息计算得到。

(四) 资源配置效应

户籍制度改革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内劳动力短缺和用工成本上升。以积分落户制度为代表的户籍制度存在明显的“学历歧视”和“技能歧视”(程郁等, 2022; 李竞博等, 2018)。因此, 收紧户籍制度会加剧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市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短缺的矛盾, 从而负向冲击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出和就业(都阳等, 2014)。其次是行业间资源配置。由于劳动力短缺, 劳动密集型行业不得不面临用工成本上涨和招工难的双重挑战, 即收紧户籍制度会通过行业间资源配置削弱劳动密集型企业活力, 影响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最后是技术进步偏好。由于要素价格扭曲, 收紧户籍限制会加剧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而非劳动(刘亚琳等, 2022)。借鉴涂正革和肖耿(2005)的生产率分解方法,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计算企业资本偏向技术进步指数和劳动偏向技术进步指数, 以此

为基础进行分析。

表 4 的第（一）部分展示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资源配置情况，结果显示收紧户籍制度显著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资产和劳动投入增长，行业工资水平也受到负面冲击。本文通过 IV-Probit 方法估计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退市和入市的概率，并将结果汇报在表 4 的第（二）部分。结果显示，收紧户籍制度显著提高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准入门槛，减少了新企业入市的概率，而对于企业退出的作用不显著。最后，通过表 4 的第（三）部分可以看出，收紧户籍制度显著促进了资本偏向型技术的发展，显著抑制了劳动偏向型技术的发展。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政府干预造成劳动力在城乡、行业之间的不均衡配置，导致农村劳均产出远低于城市劳均产出（蔡昉等，2001；韩剑、郑秋玲，2014）。考虑到农村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较高，这种产出差距不仅降低了全社会劳动收入份额，也加剧了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换言之，收紧户籍制度通过影响行业内和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从而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

表 4 资源配置效应估计结果

(一) 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资源配置				
	资产增长	营收增长	劳动雇佣	工资水平
	(1)	(2)	(3)	(4)
收紧户籍制度	-0.169* (0.099)	-0.172 (0.166)	-0.596*** (0.177)	-0.301*** (0.09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35	532	532	532
中心化 R ²	0.014	0.036	0.123	0.474
(二) 行业间资源配置				
	收紧户籍制度	退市	收紧户籍制度	入市
	(5)	(6)	(7)	(8)
收紧户籍制度		0.133 (0.625)		-1.299** (0.547)
人口超过断点	0.001*** (0.000)		0.001*** (0.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32	532	532	532

续表

(三) 偏向型技术进步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
	(9)	(10)
收紧户籍制度	0.008 ** (0.004)	-0.025 ** (0.010)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1292	1292
中心化 R ²	0.071	0.243

注：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和手工整理的户籍制度改革信息计算得到。

五 进一步分析

劳动力市场规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较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互补就业的空间，低技能劳动力是主要受益者（陆铭等，2012）；二是劳动力市场规模通过缩短失业周期、减少失业期收入损失、降低跨地区求职需求、提高新工作匹配质量和提高配偶就业概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Moretti & Yi, 2024）。因此，收紧户籍制度通过加剧落户意愿与落户能力“结构性不匹配”、限制人口流动等途径降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潜在劳动力供给，同时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规模对就业、工资收入和劳动收入份额造成影响。为了估计上述影响，本文选取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剔除其中的异常数据，最终得到 35079 个样本，其中获得本地户籍人口占比 1.65‰。图 3 中左、右图分别展示了全样本和断点右侧样本中已落户流动人口的落户时间分布情况。对比可知，在《意见》颁布之后，包含不同规模城市的全样本落户年份分布在断点右侧呈现出总体平稳但上下波动的态势。而 2014 年后断点右侧常住人口大于 500 万人的城市落户人数大幅下降。考虑到样本期内中国城市化仍处于快速推进阶段^①，即落户人数下降并非来源于城市化进程放缓，上述结果佐证了政策抑制断点右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结论。

^①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 - 2020 年中国城镇化率保持了高速增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49.68% 上升至 63.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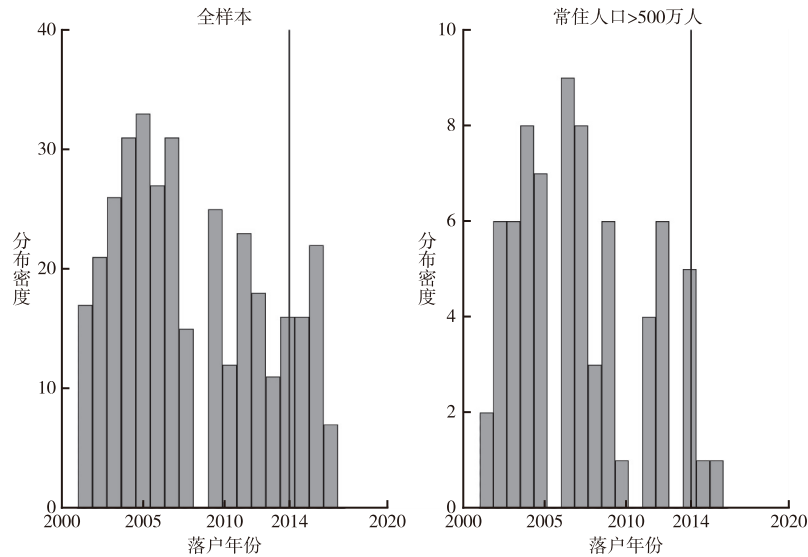


图3 落户时间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分别采用“与去年同期相比收入下降”和“五一节前一周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作为工资下降和职业稳定性的代理变量，估计收紧户籍制度通过劳动力市场规模对全行业雇员和劳动密集型行业雇员的影响^①，结果如表5所示。观察表5第（一）部分可知，收紧户籍制度对于整个流动人口就业市场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工资收入下降、同期相比工资收入下降以及职业稳定性下降三个方面。对比第（二）部分可见，劳动密集型行业雇员受到的冲击是类似的，即收紧户籍制度显著降低了该行业雇员的职业稳定性和工资收入。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管制通过降低劳动力潜在供给缩减了劳动力市场规模，从而对就业、劳动力收入造成不利影响（Sargsyan, 2015）。上述结果表明，收紧户籍制度不仅冲击劳动密集型行业，还通过包容性就业、劳动力技能互补等渠道作用于整个就业市场（陆铭等，2012），降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和职业稳定性，最终降低劳动者收入份额。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和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两个因素共同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下降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① 选择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理由在于：首先，劳动密集型行业提供的岗位多为低技能需求岗位，而高技能水平工人会自愿迁移至更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从而造成估计结果失真；其次，户籍制度存在明显的技能歧视，收紧户籍制度更多地约束了低技能劳动力；最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较高，有助于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表 5 劳动市场规模效应估计结果

	工资收入	工资下降	稳定职业
	(1)	(2)	(3)
(一) 全行业			
收紧户籍制度	-0.067 *** (0.003)	0.378 *** (0.002)	-0.027 *** (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125	35079	35079
中心化 R ²	0.060	0.060	0.023
(二) 劳动密集型行业			
收紧户籍制度	-0.096 *** (0.004)	0.394 *** (0.002)	-0.084 *** (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542	20606	20606
中心化 R ²	0.057	0.078	0.030

注：*** 表示 1% 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政策文本分析和流动人口落户年份分布对比两种方法对城市户籍制度门槛进行识别，发现 2014 - 2016 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门槛有上升趋势。基于《意见》，本文以城市人口规模是否超过 500 万人为断点，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意见》推动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收紧户籍制度，收紧户籍制度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收紧户籍制度作用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包括三方面。首先，收紧户籍制度导致城市劳动力和资本相对价格扭曲，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更多地被资本替代，具体表现为企业资本密集度和金融化程度上升、劳动雇佣下降。其次，收紧户籍制度通过行业内和行业间资源配置两种途径，不仅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也提高了该行业的准入门槛。此外，要素价格扭曲促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而非劳动。最后，收紧户籍制度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规模对劳动者就业环境带来冲击，降低了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资和职业稳定性，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收紧户籍制度还通过不平等的公共服务分配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并结合劳

动力市场规模缩减共同解释了工资水平为何下降。以上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为了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瞄准结构性难题，发挥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牵引作用。“愿落不能落、能落不愿落”的结构性难题广泛存在。以积分制度、投资或购房条件、出让土地承包权和集体经济利益为代表的落户条件导致落户意愿与落户能力不匹配，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较为有限。为了发挥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牵引作用，应当逐步放松大城市与特大城市户籍限制，降低以技能歧视、学历歧视、资产歧视为代表的隐性门槛，允许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提高城市劳动力供给，缓解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扭曲，满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此外，还应当进一步优化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取消购房、投资等限制，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落户，提升其生活质量和劳动收入水平。

第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强政策实施的协调与监督，实现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相容。在城市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推进改革的激励不相容现象，导致地方政府在具体实施改革时缺乏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甚至受到局部利益的阻碍（蔡昉，2023）。为了解决户籍制度改革激励不相容问题，应当健全政策反馈机制，及时调整和完善改革措施，确保政策效果的最大化。具体而言，对各地户籍制度改革进行激励，确保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可见度，引导地方政府从改革的早期成果中获益。建立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以提高信息透明度，方便统筹管理，让户籍制度回归身份信息登记的用途。

第三，完善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的覆盖程度与人口规模和流动半径不匹配，县域外流动的农民工由于社保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障碍，在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上与本地户籍居民差异较大（程郁等，2022）。地方政府及社区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定期开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的普法宣传，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提升其议价能力。此外，应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和住房保障政策，确保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从而增强其在城市生活中的归属感和劳动积极性。

第四，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分割、身份歧视等原因降低了中国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劳动力不能到最能发挥其价值的部门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宋扬，2019）。应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

构，减少制度性障碍，改善劳动者的就业环境和工作条件。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第27-41页。
-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2008），《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第16-28页。
- 蔡昉（2023），《户籍制度改革的效应、方向和路径》，《经济研究》第10期，第4-14页。
- 蔡昉、王德文、都阳（2001），《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4-14页。
- 蔡萌、岳希明（2018），《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第36-44页。
- 曹晖、罗楚亮（2022），《户籍限制、技能互补与高技能女性就业》，《劳动经济研究》第6期，第86-116页。
- 常进雄、朱帆、董非（2019），《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投资率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世界经济》第7期，第24-45页。
- 程郁、赵俊超、殷浩栋、伍振军、孙成龙、揭梦吟（2022），《分层次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破解“愿落不能落、能落不愿落”的两难困境》，《管理世界》第4期，第57-64页。
- 都阳、蔡昉、屈小博、程杰（2014），《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经济研究》第8期，第4-13页。
- 郭庆旺、吕冰洋（2011），《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研究》第6期，第16-30页。
- 韩剑、郑秋玲（2014），《政府干预如何导致地区资源错配——基于行业内和行业间错配的分解》，《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第69-81页。
- 李竞博、高瑗、原新（2018），《积分落户时代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人口与经济》第1期，第17-27页。

- 李连友、黄保聪、席鹏辉 (2023), 《“农转非”、劳动力流动与劳动收入份额》, 《中国软科学》第 4 期, 第 213 - 224 页。
- 李荣坦 (2015),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下降吗——兼论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社会科学研究》第 4 期, 第 28 - 34 页。
- 刘亚琳、申广军、姚洋 (2022),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新变化与再考察》, 《经济学(季刊)》第 5 期, 第 1467 - 1488 页。
- 陆铭、高虹、佐藤宏 (2012),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中国社会科学》第 10 期, 第 47 - 66 页。
- 陆暘、蔡昉 (2016),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 《世界经济》第 1 期, 第 3 - 23 页。
- 陆益龙 (2008),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第 149 - 162 页。
- 罗长远、张军 (2009), 《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第 65 - 79 页。
- 吕光明 (2011),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研究: 1993 - 2008》, 《统计研究》第 12 期, 第 22 - 28 页。
- 彭希哲、赵德余、郭秀云 (2009), 《户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第 1 - 11 页。
- 邵光学 (2015),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探析》, 《上海经济研究》第 2 期, 第 42 - 45 页。
- 宋扬 (2019), 《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收益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模型的模拟分析》, 《经济学(季刊)》第 3 期, 第 813 - 832 页。
- 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 (2011),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 1 期, 第 28 - 41 页。
- 田明、李辰、赖德胜 (2019),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悖论及解释》, 《人口与经济》第 6 期, 第 1 - 13 页。
- 涂正革、肖耿 (2005), 《中国的工业生产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 《经济研究》第 3 期, 第 4 - 15 页。
- 汪昊 (2023), 《中国劳动和资本税收负担及分配效应》, 《经济研究》第 4 期, 第 95 - 113 页。
- 魏万青 (2012), 《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 1

- 期, 第 152 - 173 页。
- 翁杰、张锐 (2017), 《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机制和效应》, 《中国人口科学》第 1 期, 第 34 - 46 页。
- 吴开亚、张力、陈筱 (2010), 《户籍改革进程的障碍: 基于城市落户门槛的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第 1 期, 第 66 - 74 页。
- 张成思、张步昙 (2015), 《再论金融与实体经济: 经济金融化视角》, 《经济学动态》第 6 期, 第 56 - 66 页。
- 张吉鹏、卢冲 (2019),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 《经济学 (季刊)》第 4 期, 第 1509 - 1530 页。
- An, Lei, Yu Qin, Jing Wu & Wei You (2024). Th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 of Relaxing Internal Migration Restri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2 (1), 161 - 200.
- Askenazy, Philippe (2005). Trade, Services, and Wage Inequalit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7 (4), 674 - 692.
- Barreca, Alan, Melanie Guldi, Jason Lindo & Glen Waddell (2011). Saving Babies? Revisiting the Effect of Very Low Birth Weight Classific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 (4), 2117 - 2123.
- Benjamin, Dwayne, Loren Brandt, John Giles & Sangui Wang (2008). 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In Loren Brandt & Thomas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29 - 775.
- Brandt, Loren, Trevor Tombe & Xiaodong Zhu (2013).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cross Time, Space and Sectors in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6 (1), 39 - 58.
- Brooks, Wyatt, Joseph Kaboski, Yao Amber Li & Wei Qian (2021). Exploitation of Labor? Classical Monopsony Power and Labor's Sha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0, 102627.
- Calonico, Sebastian, Matias Cattaneo, Max Farrell & Rocío Titiunik. (2017). Rdrobust: Software for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s. *The Stata Journal*, 17 (2), 372 - 404.
- Chen, Zhu, Qianqian Shang & Jipeng Zhang (2024). Recent Progress in Hukou Reform and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 1996 - 2022. *China Economic Review*, 87, 102231.
- Coşar, Kerem, Nezih Guner & James Tybout (2016). Firm Dynamics, Job Turnover, and Wage Distributions in an Open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3), 625 - 663.

- Daudey, Emilie & Cecilia García-Peñalosa (2007). The Personal and the Factor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3 (5), 812 – 829.
- Fanfani, Bernardo (2023).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Collective Wage Bargain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27, 105006.
- Feng, Shuaizhang, Jingliang Lu & Leilei Shen (2024). Hukou Matters: The Heterogeneous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Export Expans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52 (1), 321 – 340.
- Karabarbounis, Loukas & Brent Neiman (2013).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1), 61 – 103.
- Kongsamut, Piyabha, Sergio Rebelo & Danyang Xie (2001). Beyond Balanced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8 (4), 869 – 882.
- Lee, David & Thomas Lemieux (2010).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8 (2), 281 – 355.
- Li, Bing, Chang Liu & Stephen Teng Sun (2021). Do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Decrease Labor Shar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0, 102624.
- Meng, Xin (2012).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Reform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 (4), 75 – 102.
- Molnar, Margit, Thomas Chalaux & Qiang Ren (2017). Urbanisation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1434.
- Moretti, Enrico & Moises Yi (2024). Size Matters: Matching Externaliti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Large Labor Marke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32250.
- Sargsyan, Vahan (2015).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Is Hukou Type the Only Problem? *CERGE-EI Working Paper*, No. 548.
- Wang, Feicheng, Chris Milner & Juliane Scheffel (2021). Labour Market Reform and Firm-Level Employment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Hukou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9, 102584.
- Young, Alwyn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4), 1091 – 1135.
- Zhang, Hongsong (2019). Non-Neutral Technolog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abor Deman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0, 145 – 168.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and Labor Income Share

Feng Dianzhuang & Zhang Weigu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promoting more workers' entry into the middle-income group is a necessary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Opinions on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4,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and its mechanisms using a fuzzy RD design. By collecting and collating information on the reform at the city level, we match these data with panel data of companies listed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 and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ighten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This phenomenon occurs mainly through the following mechanisms: capital replacing labor, hindering the growth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altering the size of the labor market.

Keyword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fuzzy RD design, labor income share

JEL Classification: P21, D31

(责任编辑：马 超)